

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

[德] A-M. 威特基 E. 奥尔斯豪森 R. 希德拉克
主编

葛会鹏 古原驰 史湘浩 王聪
译

Historischer Atlas der antiken Welt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Historischer Atlas
der antiken Welt

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

[德] A-M. 威特基 E. 奥尔斯豪森 R. 希德拉克 主编
葛会鹏 古原驰 史湘洁 王聪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 / (德) A-M. 威特基, E. 奥尔斯豪森, R. 希德拉克 主编; 葛会鹏, 古原驰, 史湘洁, 王聪 译.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675-5310-1

I. ①古… II. ①A… ②葛… III. ①历史地图-世界-古代-地图集 IV. ①K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3160 号
审图号 GS (2016) 2310 号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5-904 号

Original German language edition:

Historischer Atlas der antiken Welt

by Anne-Maria Wittke/Eckart Olshausen/Richard Szydlak:

ISBN 978-3-476-02031-4

published by J.B.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und Carl Ernst Poeschel Verlag GmbH Stuttgart, Germany.

Copyright © 200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

主 编 (德) A-M. 威特基 E. 奥尔斯豪森 R. 希德拉克

译 者 葛会鹏 古原驰 史湘洁 王聪

责任编辑 徐海晴 倪为国

封面、版式设计 崔 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 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194 1/8 开

插 页 4

印 张 42.75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310-1/K.470

定 价 398.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学习古代世界历史

——《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中译本前言

刘小枫

一

1868年的冬季学期，瑞士巴塞尔大学史学教授布克哈特（1818—1897）开设了一门名为“历史研究导论”的专题课程。从名称来看，这门课程是为刚刚形成不到半个世纪的史学专业开设的。可是，布克哈特开讲就宣称，这门课程的目的“不是要培养[专业]史学家”，而是“要让学生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力，每个接受大学教育的人都应该培养这种能力”。布克哈特告诉学生们，如今“史学已经高度专业化，即使一个非常小的个别问题，也可能已经有若干专著研究过”。投身史学专业，就得准备为澄清某个很小的历史事实耗费数年时间。在19世纪的大学，所有传统学问都在走向高度“专业化”（the professionalization）。在布克哈特看来，大学的专业化训练并非是为了让学生今后“以所学专业为终身职业”，而是为了让年轻的灵魂学会如何聚精会神地获取知识，“培养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肃品格”。布克哈特告诫说，任何学科的专业化都有一个危险：让人忘记学科训练仅仅是通向精神自由的一种途径。布克哈特所谓的精神自由指的是“在智慧和情趣方面超脱日常无聊”，“不让报纸和小说”——如今我们得说媒体网文——荒废自己的精神。¹

布克哈特在近一个半世纪之前的教诲明确针对当时正在形成世界趋势的现代民主文化。他在自己的课堂上讲授世界史课程时说道：

普遍民主作为一种懵懂的冲动，从法国革命及其对人性本善和人人平等的信念中喷发出来，涌动于各个民族的里里外外。随之出现的是显著的同质性；普遍民主的基本特征以普选的形式得到了君相们本人的承认，普选可被扩展为对几乎任何事情的公投。²

民主文化让“几乎任何事情”诉诸公投不仅荒谬，而且表明一个国家或民族已然丧失精神自由。毕竟，涉及一个国家的精神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品质或优或劣的任何分歧，都不可能靠公投获得解决。布克哈特看到，民主文化的基本品质就是“日常无聊”。在商业民主化的时代，大学教育固然史无前例地普及，但民主化的大学不可能让大学生在“智慧和情趣方面超脱日常无聊”——即便设立通识教育课程也无济于事。布克哈特的“历史研究导论”就是如今的通识课，但他心里清楚，并非每个被迫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都天生具有“超脱日常无聊”的意愿。何况，民主化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教师很难具有讲授通识课程的资质和能力。毕竟，学科专业化的所谓学术规范一直在摧毁热爱智慧的情趣，让年轻的头脑因长时间“过分专注地研究”某个“内容单调且索然无味的”课题过早患上“脑瘫”（《沉思》，第16—17页）。

既然如此，布克哈特为何要在巴塞尔大学开设“历史研究导论”这门课程，而且不是为史专业的学生开呢？在布克哈特看来，已然形成世界趋势的民主文化是一个不祥的趋势，它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危机”时代。面对这样的时代处境，如果现代的大学还不至于敢公然背弃人

类古典文明关于教育的传统定义，即让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获得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事件或人物及其精神状态具有明辨是非对错好坏优劣的认识能力，就应该让大学生了解甚至研究世界历史。布克哈特觉得，既然作为大学教师，自己总得开设某种课程，那就不如开设“历史研究导论”这类通识教育式课程吧。他相信，与其给年轻的大学生灌输民主的自由权利意识，不如让他们学会“审视过去”——他用“观察”来命名这种精神活动，这是真正的自由人的“权利和义务”。通过观察世界史获得“普遍的和历史的知识”，不仅有助于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撇开个人的和暂时的担忧和顾虑”去了解处于变化中的人类状况，而且会使得天资优秀的年轻灵魂“向高处攀登”。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世上的多数人其实是“在最为简单的平民生活中度过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填饱肚子”。普遍民主观念出现以后，史学也被要求用平民“眼光”来看待历史。在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之下，民主观念推崇的这种“观察和推理”方式进入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导致了“听觉上的巨大混乱”。布克哈特非常自觉的要让自己的史学通识课抵制这种平民“眼光”的史学，让史学保持其古典品格：historia vitae magistra[历史是生活的导师]的含义是，热爱智慧的人通过认识过去让自己变得明智。因此，布克哈特说，世界史的“观察对我们意味着自由”（《沉思》，第8—9，11—12，14页）。

1870年冬季学期，布克哈特第二次讲授“历史研究导论”课，刚刚获得巴塞尔大学古典学系教席的26岁年轻人尼采也坐在讲台下面听讲——在后来的整个一生中，尼采都称布克哈特是“伟大的教师”。³

二

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发端于启蒙运动时期，而且与商业行为相关。1729年10月，伦敦的8位书商和印制商在《编年月刊》（*Monthly Chronicle*）上刊出一份联名签署的图书征订广告：即将出版一部名为《普遍历史：自最早的时代叙述到当今》（*An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 to the Present*）的史书，分“古代”和“现代”两个部分出版。征订广告称，《编年月刊》将先以连载方式刊发这部《普遍历史》，然后结集成书。不过，书商们没能做到按月连载，拖拖拉拉差不多15年后（1744），“古代部分”（the Ancient Part）才杀青。毕竟，那个时候的大学还没有史学专业，撰写这部史书的并非某些史学家，而是书商为了赚钱找来的几位业余写手，其中两位曾因在报纸上胡编乱造“史话”以 impostor [骗子] 闻名——主要写手之一是个浪迹伦敦的法国人，他用笔名普萨尔马纳扎（George Psalmanazar，1679—1763）经常给报纸写文章。为了在传媒出名，他在25岁那年就剽窃荷兰传教士的回忆录编造过一本关于中国台湾的书，谎称自己原籍台湾，其父是在台湾传教的荷兰传教士……尽管如此，《编年月刊》上连载的这部《普遍历史》很快开始风靡欧洲：1732年，法国的书商开始翻译连载，1734年，意大利的书商开始翻译连载，德意志的书商则在1745年直接翻译“古代部分”合订本——大名鼎鼎的伏尔泰和吉本都采纳过其中的“史

¹ 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4—15页（以下简称《沉思》，并随文注页码）。

² 布克哈特，《历史讲稿》，刘北成、刘研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第75页（以下随文注页码）。

³ 尼采与布克哈特的关系，参见 Alfred von Martin, *Nietzsche und Burckhardt*, 增订第二版, München, 1942, 第11—18页；亦参 Edgar Salin, *Jacob Burckhardt und Nietzsche*, Basel, 1938. 穆瑞, “《古希腊文化史》英译本序言”, 见布克哈特, 《希腊人和希腊文明》,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王大庆译, 第21—30页。

2 ▶ 《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中译本前言

料”。⁴随着贸易和自然科学双双快速发展，欧洲智识人渴望全面认识世界。

英国书商组织写手编撰这部世界史并非为了搞启蒙，毋宁说，这一商业行为既反映的是英格兰王国崛起时的需要，也反映了18世纪新知识状况的需要。现代中国知识人以为，西方人很早就有了世界史，其实，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最早出现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期的英国。何维尔（William Howell）的《通史要义》（*Institution of General History*, 1680）和拉莱夫（Walter Raleigh）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 1702）尽管相当粗疏，在当时却颇为风行。由于这两部通史仍然以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为主，涵盖面不足，采用同时代的编年史和地理学的新材料也不多，书商们就想到，搞一部新的《普遍历史》，销量必定可观。毕竟，随着国力上升，那个时候的英国人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大增。据统计，截至1730年，以征订方式在英国出版的专书有388种，其中128种涉及历史。夏克福德（S.Shuckford）的《圣和俗的世界史》（*Sacred and Profane History of the World*, 1728），以及斯潘海姆（F.Spanheim）的《编年史和圣史导引》（*Introductio ad chronologiam, et historiam sacram*, 1727）销路颇佳，让书商深受启发。⁵我们难免想起，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力急速上升，与此同时，各路书商及其编辑构想层出不穷——如今轮到世界史了……

然而，真正的史学功夫并不在于知道世界历史的史事，而在于认识和解释史事。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中阐述现代民主政制原则时，已经力图凭靠当时已知的世界地理新轮廓所提供的世界史视野来增强其论证的说服力。在孟德斯鸠激发下，索邦神学院高材生杜尔哥（1727—1781）雄心勃勃，23岁那年（1750）写下了堪称划时代的两篇论著纲要（“普遍历史两论大纲”和“关于政治地理学的论著纲要”），将自己关于俗世的进步论“普遍历史”（*histoire universelle*）的思考与政治地理学结合起来。他提出的问题包括：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的自然地理资源及其分布对商业文明的影响，地理的自然交通条件（河流、海洋）对国家间敌友关系的影响，自然地理因素与民族[国家]性格及其德性的关系等等。⁶杜尔哥相信，贯穿整个人类的一条普遍历史的发展线索是：由于商业交往不断增多，人类将走向柔化的民主道德，即所有人将获得“基本的人性化权利”。商业活动不仅是人类物质生活进步的基本推动力，也是人类道德从义务变成权利这一精神进步的推动力。⁷可以设想，如果按杜尔哥的历史哲学观来编纂一部世界历史地图集，我们看到的会是，原初处于野蛮状态的人类如何从狩猎状态、游牧状态到农耕状态再向商业状态演进。⁸直到今天，好些世界历史地图集仍然是按这种启蒙哲学式的文明史观来编纂的。⁹

1753年，伏尔泰的《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和精神》出版，史称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专著——毕竟，英国书商搞的《普遍历史》的“现代部分”（the Modern Part）在1759年开始连载，直到1768才连载完。10年后（1763），伏尔泰又为自己的这部“普遍历史”添加了长达200页的题

为“历史哲学”的“导言”，据说因此获得了发明“历史哲学”这个语词的思想史声誉。¹⁰

伏尔泰的世界史叙述“八卦”说法居多，水分太大，他的“历史哲学”看起来也委实不够哲学。接下来具有影响力的普遍历史哲学式的世界史，非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莫属。¹¹黑格尔的世界史从“自由理念”的朦胧状态开始，把现代的公民社会式国家的形成视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实证史学出现之后，史学家大多蔑视黑格尔的普遍历史哲学，认为它只有“观念”，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史料”。其实，黑格尔提出的“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的“世界史划分”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使得启蒙主义的“进步论”史观更为明晰，为好些实证史学家的世界史叙述提供了指路明灯。

三

在布克哈特看来，启蒙哲人们的所谓“历史进步”一类说法纯属胡扯。这类历史哲学式的说法不过想要在政治现实中获取“迫切需要的东西”，严肃的史学恰恰应该抛弃这些东西，尽可能客观地观察和描述“过去的斗争、冲突和多样性”。布克哈特的世界史观察拒绝从人类的“野蛮”状态开始，而是从人类的“文明”状态开始。他的理由是：“只有文明民族而非原始民族，才可纳入较高意义上的史学”。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绝非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线性进步过程，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古希腊罗马文明能够“垂范后世，无法企及”，或者为何直到近代，游牧民族仍然威胁着已经有上千年文明史的农耕民族的政治体。从“野蛮”状态开始看世界历史，不过是霍布斯以来的启蒙哲人用虚构的“自然状态”论思考国家问题所导致的可笑结果。布克哈特非常担忧：由于启蒙史学的普及，欧洲“受过教育的人”不再能够理解自己的古代文明，商业民主时代的“公众所支持的‘文化’甚至厌恨”古代文明。受过民主的启蒙教化的大众对现代商业文明满怀自负，根本不知道技术物质进步绝不等于道德文明进步，“只要求共同体尽一切可能确保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一心为自己的生存讨价还价”——“古人则相反，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不惧怕灾祸”（《历史讲稿》，第1，6—7，83，187页）。

布克哈特在100多年前的教诲仿佛就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如今，我们在技术物质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不仅需要学习中国的古代历史，也需要学习世界的古代历史——这与史学专业的事情无关，而是与保有文明危机意识相关：我们的史学专业更多关心启蒙哲学所说的历史进步，而非文明危机。与抵御外敌时打仗一样，学习历史断乎离不了地理知识和地图——历史是文明民族的生活经历，由大大小小的事件汇集而成。任何事件的基本要素都是时间、地点和人物：何时、何地、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无论史书还是史学，都是文字描述，离了地图，就无法直观地呈现事件发生的地点乃至过程。这部由德国的古典学学者编制的《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以历史地理学的方式来展现古代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史，并通过对历史事件进行分层来展现古代世界的经济、行政、宗教和文化领域的发展状况。尤其难得的是，这部历史地图集所附文字扼要阐释了古代世界的文明含义及其被探索的过程，为我们学习古代世界历史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我们组译这部历史地图集并非为了古代世界史专业或古典学专业，更非因为如其编者所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世界似乎正在变成真正的地球村”。事实上，即便世界正在变成“全球化”的地球村，也未必有多少

⁴ 关于这部《普遍历史》的编写和出版过程，见 Guido Abbattista, “The Business of Paternoster Row: Towards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Universal History (1736—1765)”, 刊于 *Publishing History*, 17 (1985), 第5—49页，编撰缘起见第8—9页。

⁵ Daniel Woolf, *Reading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England, 2003, 第284—285页。

⁶ 沃格林，《危机与人的启示》，刘景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35页。

⁷ Ronald L. Meek 编 / 译, *Turgot on Progress,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2010, 第73—75页。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刊布于1766年，10年后，亚当·斯密出版了《探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中译本：《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996）。

⁸ 康德在1786年发表的《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一文对这种四阶段论有简厄精炼的描述，见《康德全集》卷八，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21—123页。

⁹ 巴勒克夫拉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毛昭晰、刘家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第34—39页；亦参吴于廑主编，《大学世界历史地图：从地图看世界历史行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997。

¹⁰ 中译本见伏尔泰，《风俗论》，三卷，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¹¹ 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刘立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尤其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995，第351—360。

人会生发“研习世界上曾经存在的古代文明”的愿望。我们组译这部历史地图集，仅仅为了让所有愿意“在智慧和情趣方面超脱日常无聊”的中国年轻人懂得：近200年来，中国所遭遇的“征服世界的力量”究竟是怎么来的。

这部历史地图集演示了宏大的古代世界历史，时间跨度上起公元前3千纪（古代近东）、下至公元15世纪拜占庭帝国覆亡，尤其聚焦于古典时期东西文明之间的交往。编者宣称“以冷静、公正的态度回顾人类历史……不再局限于地中海世界的希腊、罗马文明”，而是涵盖古代近东地区诸多文明，关注的主题也更加宽泛。尽管如此，这部历史地图集并没有涵盖古代远东文明。对中国和印度古代文明只字不提，能够擅用“世界”这个词吗？

四

这部历史地图集的编者们的“世界史”观念将整个远东地区的古代文明排除在外，我们禁不住马上要给他们扣上一顶“欧洲中心论”的帽子。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1795—1886）在85岁那年（1880）开始出版的多卷本《世界史》，已经将远东古代文明排除在他的“世界史”观念之外。在兰克看来，“世界历史”不是自然史，而是政治史——相互争斗才使得民族或国家走出自然状态，形成文明意识。因此，“世界历史”这个概念指的是文明国家之间相互斗争的历史，或者说，各个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相互争斗才形成了世界历史。兰克把中国和印度古代文明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的理由是：只有在古代的近东和地中海周边才出现了诸文明国家（或称为“大国”）之间的激烈拼搏。¹²相比之下，古代的远东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激烈的“大国”冲突。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在发展出“被视为人类所有文明发展之源”的政制之后，就“静止不变”了。¹³布克哈特尽管不赞同自己的老师兰克的“大国”冲突论，他的世界史观察同样把中国和印度等古老“文明民族”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其理由与兰克如出一辙：

环地中海和远至波斯湾的各民族实在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存在，是最优秀的活跃人群。在罗马帝国中，这一存在果然达成了一种统一。只在这里，精神的各个前提才得以实现；只在这里，发展才占优势，没有绝对的衰落，而只有变迁。

在与日耳曼民族新的融合之后，在又一个1500年或2000年之后，这一活跃的人群重新脱颖而出，它消化了美洲，而今即将彻底打开亚洲。还有多久，一切消极的存在都将被它征服和浸透？非高加索人种抵抗、屈服、灭亡。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那时已为这一征服世界的力量奠定了基础。不但通过跳跃和对立面的激发，也通过缓慢的发展，我们在精神上与他们联系在一起。能够从属于这一活跃的人群，实乃幸甚。（《历史讲稿》，第2页）

无论兰克还是布克哈特，其“世界历史”观的基础都来自古希腊人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学：“自然界的历史告诉我们，要想生存就不能避免令人心惊肉跳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也延伸到人类的生活和历史中”；因此，“生命只能在运动过程中孕育，不管这种运动有多么痛苦”（《历史讲稿》，第247，248页）。“斗争”是赫拉克利特自然哲学的关键概念；“运动”是修昔底德政治史学的关键概念，与兰克一样，

布克哈特理解“世界历史”的立足点是现代欧洲所经历的剧烈“历史运动”，而他们仅仅在古代的地中海周边世界才见到过类似的“历史运动”。因此兰克说，历史中的“普遍联系”是“世界性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为欧洲各王国之间的殊死搏斗（《秘密》，第328页）。

对我们来说，“民族国家”是个现代概念，对于兰克或布克哈特这样的世界史家来说，则会是个古代概念。用这个概念来看待地球远东地区的历史毫无意义，毕竟，在远东的古代，并没有出现文明国家之间的冲突，长期存在的仅仅是定居的“文明”政治体与游居的“野蛮”政治体的冲突。与现代中国遭遇源自欧洲的世界历史“运动”相比，古代中国被元人和清人征服真算不上征服。20世纪的西方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在给整个欧洲的中学生写的世界史教科书中还说：“远东那些伟大的文明，尤其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遇到的麻烦，主要是“其疆域内蒙昧原始的地区”。当然，“来自广袤的沙漠和大草原（对中国来说在其西部和北部，对印度来说是在其北部和西部）”各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具有“天罚般的”力量。但是，这些民族尽管“凶猛、残酷、富有亡命徒精神”，“对我们现在的文明研究”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劫掠无疑延迟了与他们毗邻的那些大型文明的发展”。¹⁴

如今的中国知识人喜欢自豪地说：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唯有中国文明政制在数千年的历史颠沛中不绝若线，无论种族还是政体更不用说语文，从未遭遇过覆亡。然而，早在18世纪，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就对这种自豪感表示过轻蔑，并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延续性给出过“合理解释”：古代中国的文明政制能够长期存在，不过是因为没有遭遇过强壮的文明民族的攻击。休谟的说法还算比较客气：

虽然中国政府是纯粹君主制，但确切地说，它不是绝对专制。这是由于中国有如下特点：除了鞑靼人之外它没有什么邻国；对鞑靼人，中国由于建造了万里长城，还由于人口极多，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安全保障，至少看上去有安全感。¹⁵

康德的说法就不那么客气了——他在谈到战争是“文化”的推动力时说：

只要看看中国：它按照自己的位置也许必须一度担心一场出乎意料的侵袭，但却无须担心任何强大的敌人，且因此自由的一切痕迹在那里都被灭绝。所以，在人类目前尚处的文化阶段上，战争是使文化继续进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且唯有在一种文化完成（谁知道什么时候）之后，一种持久的和平才会对我们有益，而且也唯有通过那种文化才有可能。（《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前揭，第124页）

康德在这里所说的“文化”就是布克哈特的时代已经成为世界历史趋势的现代自由民主文化——如今我们追慕的“全球化”。即便布克哈特也自豪地在历史课上说：

无论我们为之喜悦或悲哀，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无需期盼而只能作为现实而遭遇的，即欧洲作为多种生活的一个古老和崭新的中心，作为产生了最为丰富的形态的地方，作为融入这么一个整体的所有对立面的家园，一切知识见解都在这里发出声音，得到表达。

这就是欧洲：在丰碑、图画和言辞中，在制度、政党直至在个人中，所有力量的自我表达；所有方面和向度上充实的精神生活；精神为留

¹² 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约尔旦/吕森编，杨培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3—14页。

¹³ 兰克，《世界历史的秘密》，易兰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第334—335页（以下简称《秘密》，并随文注页码）。

¹⁴ 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第201—202页。

¹⁵ 休谟，《人性的高贵与卑劣》，杨适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第47页。

4 ▶ 《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中译本前言

下关于它所经验到的一切事物的知识而奋斗，不去默默服从各种世界君主制和神权政治，就像东方因其一元化君主制而做的那样。（《历史讲稿》，第179页）

游牧民族入侵并入主中国并没有中断中国文明，而是让自己融入了中国文明政制。满人仅仅在如下意义上“延迟了”中国文明的发展：未能即时地有效应对西方民族为了实现自由民主文化而发动的东征。在康德式的“文化”战争的冲击下，中国第一次遭遇强壮的文明民族的攻击——中国虽然还没有覆亡，知识人的文明意识已然濒临覆亡。

五

无论如何，这部《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的编者把中国的古代历史排除在外，并非没有他们的理由，我们没必要感到自己的文明情感受到伤害。相反，我们倒是应该深入认识他们欧洲人所理解的“古代世界历史”。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虽然记载外国达58国之多，有中国最早的“世界”地理书之称，必须承认，我国古人的确没有经历过惨烈得你死我活的国际性文明政制冲突。¹⁶ 纳兰容若（1655—1685）奉使索伦途中写过一首出塞词蝶恋花，其曰：

今古河山无定数。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

幽怨从前何处诉。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纳兰容若饱读过中国诗书，才获得如此“情深而文明”的感觉。中国文明的伟大教化力量的确在于，生于清初的纳兰容若出塞后也会觉得“满目荒凉”，并用极佳的中文修养来表达自己的“荒凉”感——虽然这“满目荒凉”之地就是游牧部族曾经的家园或征战之地。游牧部族的英雄做了中国皇帝，也带领诸多北方游牧部族归顺了华夏文明的政制。如果纳兰容若出塞后继续往西去，穿过中亚，进入后来大英帝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麦金德（1861—1947）所界定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大低地”地区，他会看到什么呢？他会看到，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内战演变而来的一场历时30年的欧洲国际战争刚刚结束，处处满目苍夷。¹⁷100年后，德意志诗人、史书作家席勒（1759—1805）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出版的《三十年战争史》（1791）中还说：由于这场战争惨烈得史无前例，诗人要闭嘴，史家要闭上眼睛。¹⁸

¹⁶ 1913至1914年间，掌控印度的英国殖民统治者趁中国帝制崩溃后的乱局制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1959年，趁中苏关系交恶之机，印度试图进一步蚕食中国西南部领土，至1962年晚夏，蚕食陡然升级。中国与印方多次协调无效，于10月发起反击，并宣布中国军队不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尽管如此，歼灭入侵印军后，中国领导人随即宣布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后撤，主动求和。欧洲政治家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大国在战场上取得完胜之后主动回撤，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世界历史上“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参见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第473页）。欧洲人不能理解，在毛泽东的历史意识中，中国与印度这两个比邻的文明大国在历史上从未因相互觊觎而兵戎相见。尽管自由民主的现代印度政治家从西方殖民者那里学来了觊觎别国土地的恶习，毛泽东仍然秉承中国的文明传统善待历史上的友好邻邦。1962年11月，中国政府的一份涉及印度问题的外交信函措辞已经相当温和，毛泽东亲自修改得更温和（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卷五（1961—196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170—171页）。

¹⁷ 战争期间（1629年），31岁的霍布斯出版了自己翻译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志》英译本。¹⁸ 席勒，《三十年战争史》，沈国琴、丁建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亦参R.G. Asch, *The Thirty Years War.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Europe 1618-1648*, London, 1997.

纳兰容若主持编纂了《通志堂经解》，熟悉华夏文明的历史。但是，由于缺乏欧洲的“古代世界历史”知识，即便他看到德意志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惨烈场景，他也不会明白，这场战争标志着史无前例的世界历史“运动”正在形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虽然确立了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领土、主权与独立等原则，却拉开了欧洲土地上更为持久、更为惨烈的国际战争的历史帷幕。随后，基于“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论的民主理论在欧洲连绵不断的内战和国际战争中长足发展，并最终迎来了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由一场内乱摇身为普世“民主理想”的化身，随后的拿破仑果然采用康德所说的“战争”这一“不可或缺的手段”来实现普世的“民主文化”理想。¹⁹“拿破仑从西班牙到俄国的战争让每个人都知悉，革命不仅仅是法国宪政改革的问题”，更是“民主理想”的国际化问题——华盛顿在1798年已经写信告诉拉法叶：自由民主的种子“将会一步步长遍全球”，“美利坚合众国将成为所有国家的立法者”。²⁰长达16年的拿破仑战争（1799—1815）虽败犹荣，1815年的“神圣同盟”条约不过“一纸崇高的废话”，从国际法角度来看则是一纸空文。拿破仑战争之后的100年内（1815—1914），由“普遍民主”理想所驱动战争迅速扩大为今天的世界性战争，“普遍民主”的欧洲式“运动”一步一个脚印吞噬世界历史中所有文明民族的“今古河山”。如沃格林所看到的，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1944年的《雅尔塔协议》，300年间无数的和约仅仅证明：人们绝不应该相信，这个世界凭靠一份国际条约就“可以免除困苦和恐惧”。²¹

纳兰容若这样的皇族精英如果在其有生之年知道一点儿世界历史地理的政治知识，帝国的命运说不定会有所不同。可是，说到历史地理学，我们又难免有历史自豪感。据说，《汉书·地理志》中的下面这段话表明我国早就有了历史地理学：“汉兴，因秦制，……至汉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然而，由于古代中国从未遭遇过希波战争、布匿战争或英法百年战争那样的文明冲突，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历来主要关注疆域内部的行政沿革，而非像西方的历史地理学那样被迫关注世界性的文明政治冲突。晚清时期大量引介西方地理学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仍然没有脱离所谓“沿革地理学”的习惯。²²我们的孩子在名牌幼儿园长大，不可能养成在镇上长大的孩子那样的生存感觉——镇上到处是陌生人，且随时可能出现各色品性的团伙或盲流。英格兰经历过数百年与法兰西冲突的历史，麦金德在这样的国土上长大，其历史地理学的视野和关注不可能仅仅在于英格兰王国的历史沿革。在他眼里，古代中国虽治理良好，却长期处于“呆滞状态”，不值一提——我们没有理由为此不屑一顾生气。²³

依据欧洲传统的“古代世界历史”经验，兰克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发表的《诸大国》（1833）一文提出，世界的历史“运动”总是呈现为：大国可能沦为小国，小国可能崛起为大国。17世纪末，“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

¹⁹ 杜尔哥的学生孔多塞在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按启蒙哲学的文明史四阶段论勾勒出历史精神的进步纲要，参见孔多塞，《人类精神历史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1973/2010，第3—4，13—22页。

²⁰ 沃格林，《危机和人的启示》，前揭，第207页。

²¹ 沃格林，同上，第214—215页。关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和约”，参见Fled L. Israel编，《Major Peace Treaties of Modern History 1648-1967》，四卷，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67。

²² 参见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商务印书馆在1904引进日人小川银次郎编制的《东洋历史地图》和《西洋历史地图》，作为最新中等教科书（张元济校订）。《西洋历史地图》共20幅38图，从古代迄至近世，“凡欧洲历史变迁沿革有大关系者，皆有图以明之”。参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40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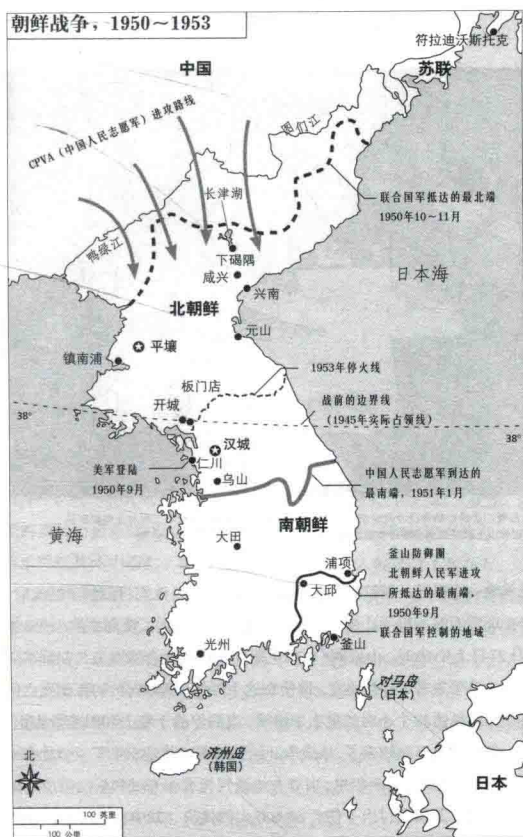
²³ 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第20页。

六

俄国——开始卷入欧洲的历史“运动”，或者说进入了兰克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俄国要崛起为“大国”，不可避免会与既存“大国”展开较量。北欧的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之后成为大国，俄罗斯崛起首先面临瑞典的遏制。俄罗斯并非兰克眼中的“欧洲民族”，但他相当赞赏彼得大帝（1672—1725，清康熙十一年—清雍正三年）带领俄罗斯“以孜孜不倦如饥似渴的学习天性的全部激情”吸纳西方文明的“种种进步”要素，然后与“欧洲民族”殊死较量。彼得大帝明白自己国家的文明目的是建立“希腊—斯拉夫原则”，瑞典国王查理二世却不清楚“自己国家的真正利益在哪里”，结果使得瑞典王国在与俄国的拼搏中遭受重挫，从大国地位上“被拉了下来”，沦为无足轻重的国家（《秘密》，第176页）。

具有文明抱负的国家之间的争雄，首先比拼的是代表文明国家品格的卓越人物身上的政治德性。在《诸大国》一文中，兰克给出的另一个史例是普鲁士王国的国父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在兰克看来，这位德意志的政治和军事“天才”的思想扎根于“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祖国”。他的历史事功让在列强夹缝中生存的小小王国仅仅凭靠自己的力量成为“大国”，给德意志人带来“自信”，使得近千年来散漫惯了的德意志人终于有了形成统一的文明政治单位的基础。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是诗人，且酷爱启蒙哲学，在我们看来，他的诗人才华显然没法与毛泽东相提并论。但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诗作同样产生于与国家的敌人殊死较量的危难处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男子气概的灵魂激荡”——如兰克所说，越是生死存亡关头，这种伟大的灵魂越显出自己的道德力量。在“七年战争”中，弗里德里希二世“伟大的个人品格”体现得最为充分，即便知道这场战争仅有极小的把握打赢，他的道德上“坚忍不拔”的品格让他义无反顾地面对不可避免战争：自己生长的“土地”被敌人围困、国家的“荣誉”被

剥夺、祖国孤立无援，除了战争还能靠什么让自己的国家摆脱险境呢（《秘密》，第181—183页）。凭靠这场险胜的“七年战争”，弗里德里希二世让德意志人以文明国家身份登上了历史的“世界舞台”——正如凭靠极为艰难的朝鲜半岛战争，毛泽东让中国登上了历史的“世界舞台”，进入了欧洲人认可的“世界历史”……世界历史地图集从此增添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页，尽管在我们自己编制的历史地图集里，这一页迄今尚未得



朝鲜战争示意全图

到足以与其历史意义相匹配的版面尺度。²⁴

康德以为，实现了自由民主“文化”就会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但要实现这种“文化”还得凭靠战争。因为，战争才会迫使“国家元首们”“看到共同体的各阶层为了相互促进自己的富裕而紧密结合起来”。²⁵与此相反，同样信奉自由主义的历史地理政治学家麦金德却相信，“民主的理想”必然开放地球上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所有国家产生追求富裕的欲望。由于世界上的自然地理资源并未平等分配，“平等”的权利诉求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性国际冲突，西方民主国家必须在全球枢纽地带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随时准备发动战争，才能保障自身利益。换言之，康德和麦金德以不同的理由相信，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需要战争。麦金德非常忧虑：由于长期灌输“民主的理想”，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在考虑问题时仅仅从个人的“自由”、“平等”观念出发，不知道还有“从国家战略上思考”这回事。其结果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自由的各种理想已经成了普通公民的固执偏见”，国民仅关心“个人的种种权利”，不懂得“维持我们的自由的安全”必须凭靠国家权力及其以“民主理想”的名义发动战争的组织能力。²⁶

麦金德的担忧同样基于“欧洲民族”所具有的“古代世界”的历史经验。虽然与德国人兰克和瑞士人布克哈特是完全不同的学者，麦金德与他们一样相信：唯有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种族的历史才算得上世界历史，“因为，使希腊和罗马的继承者统治整个世界的那些观念来自这些种族之间”。²⁷布克哈特在大学开设“历史研究导论”课，出于与后来的麦金德同样的忧虑。他已经看到，西方的国家观念和文化观念“出现了重大危机”：自由民主理论家们不断要求国家随时按民众的情绪来调整自己，公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可程度已经降到极点。与此同时，这些人又要求国家必须完成他们定期交付给它的保障公民富裕和安全的义务。竞相角逐的党派各自要求国家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在国家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国家本身变得无所适从（《沉思》，第126—127页）。

在布克哈特看来，康德所憧憬的自由民主“文化”前景实质上是欧洲文明的彻底沦落。因为，这种“文化”要求国家乃至文化本身充当市民趣味的外衣，而基督教欧洲的市民已经被教育成唯利是图的人民，由民众主导的文化必然是“日常无聊”的文化。自由民主理论家们宣称能够通过普及教育把所有市民造就成“不同寻常地重要的个体”，实际上“只能以拔苗助长的方式培养平庸之辈”。就文化的品质而言，自由民主“文化”的所谓“进步”其实是“退步”，因为，现代生活“只不过是一种生意，现代之前的生活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布克哈特一再提到，美国就是这种“没有历史文化根基”的“生意”国家的代表。欧洲的民主思想家从所谓自然状态这一哲学假设出发探究国家的起源和性质，无异于废除欧洲文明的历史传统，向壁“虚构”出一种普遍的国家形式。美国就是按照这种“虚构”出来的国家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野蛮人和现代美国的文明人毫无历史意识”（《沉思》，第57—62页；《历史讲稿》，第3页）。倘若如此，令人费解的是，当今的中国把模仿美国作为自己的文明目的，怎么就成了伟大的“文化复兴”？

布克哈特在“历史研究导论”课上说：“强者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弱者身上的权力，构成了世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问题在于，弱者并不意味着文化的高贵品质很低，强者就意味着文明的高贵。恰恰相反，一个比较低级的“野蛮”文化占上风，并凭靠自己的强势使用种种权

²⁴ 在吴于廑主编的《大学世界历史地图》（前揭，第63页）和张芝联、刘学荣主编的《世界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第164页）中，朝鲜战争都仅占半页，尚未获得单独篇幅（另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中国战争史地图集》，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第367—376页）。

²⁵ 康德，《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前揭，第124页。

²⁶ 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前揭，第24—25，31—33，151—154页。

²⁷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慰、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010，第51页。

6 ▶ 《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中译本前言

力的情形，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蒙古人的入侵和扩张就是如此，“亚洲似乎一直未能从两次蒙古人的统治下所遭受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罗马人“以最令人恐怖的手段开始征服东方和西方，并且以血流成河的代价完成了扩张活动”，这是另一种强者支配弱者的行为，其目的是创造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并通过这个文化让一个新的世界性宗教传播开来。“后来，这两个元素传给了卷入民族迁徙中的野蛮的日耳曼人，并且最终成为新的欧洲的黏合剂”。现代西方人的过错仅仅在于：用强权让低俗的民主文化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这是对世界的文明历史犯下的可怕罪恶（《沉思》，第250，251页）。

出于一往情深的文明意识的深切忧虑，布克哈特在开设“历史研究导论”课的同时，也开设了“古希腊文化史”课程。他充满绝望地期许，“只要我们当前的西方文化一息尚存，我们就将通过吸收形形色色的过去事物来内在丰富自己，并把早先世界各个时期精神的状况和变化看作对我们自身精神意识的巨大促进”（《历史讲稿》，第72—73页）。对于我们来说，布克哈特对古代世界历史所作的如下观察则应该被“看作对我们自身精神意识的巨大促进”：

有些民族静止不前，他们几百年保持同一个整体的形象。在外人看来，他们好像对自己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满足。（《沉思》，第248页）

在布克哈特眼里，古代中国就是这样的民族……古代欧洲民族的品质是怎样的呢？

他们需要时不时地把自己的力量，甚至自己的全部力量，通过剧烈的运动释放出去。这些剧烈运动的作用是毁坏旧东西，为新东西开辟道路。在这些剧烈的运动中，除了偶尔感受到短暂的胜利喜悦之外，他们甚至享受不到任何幸福，更不用说长久幸福，因为那些胜利本身就是暂时的。他们层出不穷的力量源泉在于永不满足，他们新迈出的步子还没有站稳，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迈出下一步。（《沉思》，第249页）

布克哈特告诉西方的大学生们：诗人荷马已经展示了西方民族的这种本能——《奥德赛》的结尾让人看到，主人公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一个接着一个，他面临的考验似乎没有尽头……（《沉思》，第248页）

我们早就知道：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布克哈特的世界史课则让我们知道，西方人从自己所理解的古代世界的历史中看到，“西方的生活就是斗争”（《历史讲稿》，第187页）。倘若如此，我们就不应该自欺欺人地相信：有自己的古代历史经验的西方人会相信中国人自古以来主张的“和为贵”。美国虽然是“生意”国家，他们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忘记，也绝不会忘记修昔底德传授的政治经验和布克哈特的谆谆教诲。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放下自己的历史自豪感，认真阅读西方古典学家们把古代中国排除在外的《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否则，轮到美籍华人写纳兰若容那样的出塞词的时代，一定不会太远。

2016年5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出版说明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世界似乎正在变成真正的地球村。或许应该说，人类视野的拓宽正使我们前所未有的用全球化视野来考察区域问题。我们需要以冷静、公正的态度回顾人类历史。近年来，学界开始以“全球化”为视角来研习世界上曾经存在的古代文明，不再局限于地中海世界的希腊、罗马文明，同时增加对地中海周边文明的区域研究，关注的主题也更加宽泛。古代文明中的“原住民”问题、“黑暗时代”和“古代文明晚期”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重新回到学者研究的视野中。此外，历史地理学的多维考察视角也逐渐得到学界认可，并在历史研究领域逐渐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新视角

这部《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学界研究的新视角：

1. 地图集展现了宏大的历史观，全书共有 161 幅彩色地图，44 幅插图，时间跨度从公元前 3 千纪（古代近东）至公元 15 世纪（拜占庭帝国），其中选取的地图具有多样性、多元化的特点，体现出学界的新成果、新发现。

2. 地图集涵盖古代近东地区诸多文明，将古代史研究投射到王朝和王国发展中的人的因素，更加聚焦于古典时期（此前将古代近东地区视为古典时代的边缘化文明形态）东西文明之间的交往。此外，之前所忽略的研究，如爱琴文明早期、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地区、古代晚期的历史发展状况都在本地图集中有所体现。

3. 地图集不仅展现了古代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史，同时还反映了经济、行政、宗教和文化领域的发展状况。因此，地图集中不惜笔墨来阐释古代世界的含义及其被探索的过程，罗马行省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亦均在其中得到了体现。此外，本地图集也涵盖了古代世界的贸易商路、文明之间的经济往来和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4. 地图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图像化，我们试图以地图来演示历史发展的脉络，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分层并清晰展现的同时，仍然做到突出重点。此外，我们还使用了大量的增补图，以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本地图集最大的优点在于使用直观地图来表现历史事件的同时，也以释文辅助读者了解历史事件本身，而合理的设计也使释文和地图的结合成为可能。

5. 版面上，采用释文、地图双面排版设计，针对地图中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历史概念进行详细介绍。另外，地图集中的资料来源、插图、表格、参考文献等内容都成为这部新保利地图集的最大特色。

阅读人群

本地图集阅读群体广泛，适合当前西方古典学教学与研究。地图集中的释文部分为理解和阅读地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同时亦适合学生和历史学爱好者阅读、学习之用。

成书保障

《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作为“新保利系列丛书”增补版得到了《新保利古代世界百科全书》（*New Pauly Encyclopaedia of the Ancient World*）的支持。《新保利古代世界百科全书》中的地图（即“新保利”地图）已经在学界科研和学校教学工作中受到广泛认可。因此，增补版自然而然地延续了其制图理念，而为增补版绘制地图的三位主要作者也在此前绘制“新保利”地图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

读者在使用地图的过程中将遇到“新保利”地图中的部分内容，事实上，增补版中 60% 的地图皆源自其中，并在其基础上完善而成。尤为需要指出的是，本地图集在对“新保利”地图中大部分内容重新设计着色、使之更加简洁直观的同时，又再次全面修订，更加突出了重点和新视角。

此外，本地图集还借鉴了《巴灵顿古代希腊和罗马世界地图集》（*R.J.A. Talbert, Barrington Atlas of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 2000*）。文中关于历代统治者的内容来源于新保利增补卷第 1 卷《古代世界年表》中的内容（*W.Eder/J.Renger, Chronologies of the Ancient World, Supplement Vol.1 of the New Pauly, 2007*）。《新保利古代世界百科全书》中的学术文章则成为本地图集释文部分的主要参考来源。

主要作者

本地图集的三位主要作者分工如下：

图宾根大学古典学系 A-M. 威特基（*Anne-Maria Wittke*）承担人类早期文明至希腊化时期的地图绘制工作，同时她与 R. 希德拉克（*Richard Szydlak*）编辑了索引部分。

斯图加特大学古代史系 E. 奥尔森豪森（*Eckart Olshausen*）设计了古代罗马时期至拜占庭时期的地图。

图宾根大学的希德拉克负责全书地图绘制的整个流程。他同历史学家们的合作与交流是高质量完成绘图的保障，这也使他成为本地图集不可或缺的作者之一。

其他专家学者也对本书做出了极大贡献，此前他们参与了“新保利”地图的编撰，这些作者的详细信息参见附录第 283 页。

致谢

在此首先要感谢的是弗·索尔（*Ver Sauer*）对绘制全新地图的构思，感谢奥尔森豪森教授对本书释文和索引部分的最终编校，感谢他监制了后期的整个印刷流程。感谢苏珊·费舍尔（*Susanne Fische*）对地图和释文部分的修改，感谢克里斯汀·温克勒（*Christian Winkle*）在地图编辑中所做的大量工作。

同样要感谢的是德国梅茨勒出版社（*J.B.Metzler Verlag*）的奥利弗·舒茨（*Oliver Schutze*），正是他的耐心校对和编辑使得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感谢德国图宾根大学古典考古研究院托马斯·谢弗教授（*Prof. Thomas Schafer*）与斯图加特历史研究院的合作项目为本书提供的支持；特别感谢沃尔特·艾德（*Walter Eder*）和其他同事耐心阅读书稿，并提出宝贵意见。

最后，感谢出版社的伯纳德·鲁兹（*Bernd Lutz*，本书策划者）、约翰内斯·昆泽米勒（*Johannes Kunsemüller*）和君特·斯维泽（*Gunter Schweitzer*）多年来的支持。

A-M. 威特基

E. 奥尔森豪森

R. 希德拉克

2007 年 10 月

8 ▶ 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

“新保利系列丛书”增补版拟在《新保利古代世界百科全书》（第1—5卷）的基础上加以增补和扩充。该地图集既可单独成册，亦可与《新保利古代世界百科全书》（该书以英文字母为序）配合使用。在编辑该地图集的过程中，编者尤其注重古今地名的对照，并将地名制成索引，方便读者检索《新保利丛书·索引卷》中出现的地名。

双面版式

地图集采用双面排版设计，释文部分位于左侧，彩色地图位于右侧。释文包含增补图、图表、资料来源和参考文献等内容。为确保版面设计的一致性，地图集将部分资料来源、参考文献和图表附于书末附录中。鉴于编者无法将释文中出现的所有地名标注在地图上，我们建议读者在地图集的索引部分查阅相关地名。

字体和印刷

针对地图集中出现的地形学名词，如地名、行省等，作者均给出了完整的古代名称与写法；针对近代以来的地名，我们则使用草书体字体加以标识；其他特殊的印刷标识均在相关地图的图例中得到说明。地图集中关于古代东方地区的地名沿用了《图宾根近东地图集》（*Tübinger Atlas des Vorderen Orients*）中使用的名称。除以上情况外，其他地名按照英文排版印刷。

参考文献和图表

地图集中的参考文献和图表在沿用“新保利系列丛书”的缩写规范（参见书末附录的缩写表）基础上，同时兼顾学术期刊、学术专著和古代著作家的缩写名称，力求与之保持一致。

索引

针对地图中出现的内容，索引主要包括：地名、区域名、人种、王国、行省、教区、河流、山丘、山脉、山谷、道路、历史人物、王朝、历史时期、同盟、战争、战役、和平条约、自然资源、农作物和释文中出现的其他专业词条。

针对索引中的非地名或族群的名称，我们给出了如下注解：河流、海角、沙漠、教区、岛屿、王国、山脉、绿洲、山谷、人种、郡县、行省、行政区、道路（商路）、海峡、领地、行政军区、部落。

索引中未专门注解的名词通常可以通过地图坐标已标识出的名词推断出含义，这类名词通常表示地名，而非人名。

索引部分将包含地形学标识（山脉、湖泊、海洋等）的名词同时分类在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两类中，如“阿尔巴努斯山”（*Albanus mons*）和“山脉阿尔巴努斯”（*mons Albanus*）。罗马人的名字通常以家族名称呼，只有非常著名的人物才以别号相称，诸如凯撒、西塞罗和马克·安东尼。

目录

地图与释文

第一章 古代关于世界的概念和探索

埃及和古代近东地区人们的世界观【2】

古代著作家视阈中的世界【4】

古代世界的地理探索【6】

第二章 早期高级文明时代（公元前 3000—前 1200 年）

公元前 3 千纪下半叶的美索不达米亚【10】

公元前 17 和前 16 世纪的古代近东地区【12】

公元前 15 至前 13 世纪的古代近东和中东【14】

古王国和第一中间期时期的埃及【16】

中王国和第二中间期时期的埃及【18】

新王国时期的埃及【20】

赫梯帝国，公元前 13 世纪的“哈图萨”【22】

青铜时代的爱琴海地区【24】

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文明【26】

青铜时代晚期的地中海东部【28】

青铜器时代晚期 / 向铁器时代过渡时期【30】

第三章 东部帝国时代（公元前 12—前 6 世纪）

Part A 东部帝国

地中海东部和古代近东地区（公元前 12 世纪—前 10 世纪中叶）【32】

希腊、爱琴海和小亚细亚西部（公元前 12—前 9 世纪）【34】

希腊、爱琴海和小亚细亚西部（公元前 9 世纪后期—公元前 6 世纪中叶）【36】

安纳托利亚（公元前 10—前 7 世纪）【38】

乌拉图和安纳托利亚东部（约公元前 700 年）【40】

鲁维 - 阿拉姆语王国（约公元前 900 年）【42】

巴勒斯坦（公元前 10—前 6 世纪）【44】

美索不达米亚和黎凡特（公元前 10 和前 9 世纪）【46】

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地区（公元前 819—前 746 年）【48】

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地区（公元前 745—前 711 年）【50】

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地区（公元前 8 世纪晚期—公元前 7 世纪）【52】

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地区（公元前 7 世纪晚期—公元前 6 世纪）【54】

新巴比伦帝国时期的 Bābīlu（“神之门”）/ 巴比伦城（公元前 7/6 世纪）【56】

第三中间期和晚王朝时期的埃及（公元前 1080—前 332 年）【58】

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字母文字、音节文字的主要分布区域【60】

第四章 东部帝国时代（公元前 12—前 6 世纪）

Part B 地中海西部的早期历史

伊比利亚半岛及其对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的衔接作用【62】

公元前 10 至前 8 世纪的意大利【64】

拉丁语传播之前的古意大利地区诸语言【66】

腓尼基人、希腊人和埃特鲁里亚人在地中海地区的殖民活动【68】

地中海西部的腓尼基人和西腓尼基人 / 迦太基人领地【70】

迦太基【72】

埃特鲁里亚核心领地【74】

埃特鲁里亚人、西腓尼基人同希腊人的冲突（公元前 6 世纪—约公元前 400 年）【76】

哈尔施塔特文明（约公元前 800—前 450 年）【78】

拉坦诺文明（公元前 450 年—约公元 1 年）【80】

欧洲中部的贸易关系（公元前 8—前 5 世纪）【82】

地中海世界的商业与贸易（公元前 7/6—前 4 世纪）【84】

第五章 地中海世纪的重构（公元前 6—前 4/3 世纪）

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 6—前 4 世纪）【86】

希波战争（约公元前 500—前 478/449 年）【88】

希腊的城市发展与城镇规划【90】

古风 and 古典时期的僭主政治【92】

提洛同盟（公元前 478—前 404 年）【94】

伯罗奔半岛战争（公元前 431—前 404 年）【96】

希腊世界谋求霸权的同盟组织（公元前 4 世纪）【98】

希腊诸同盟【100】

马其顿王国的发展（公元前 7 世纪—公元前 336 年）【104】

罗马共同体：意大利的 4 个城市部落与 31 个乡村部落（约公元前 500—前 241 年）【106】

格拉古之前罗马在意大利的殖民情况 / 拉丁城市同盟【108】

《尤利亚法》颁布之前罗马向埃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地区的扩张（公元前 4 世纪—公元前 90/88 年）【110】

第六章 强权时代（公元前 4/3—前 1 世纪）

Part A 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继承者政权

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战（公元前 336—前 323 年）【112】

继业者王国（约公元前 303 年）【114】

公元前 3 世纪的希腊化世界【116】

希腊化时期的城市建设与教育机制（公元前 4—前 2 世纪）【118】

公元前 4 至前 1 世纪的埃及【120】

六次叙利亚战争（公元前 275/274—前 168 年）【122】

阿塔利家族的帕加马王国（公元前 241—前 185 年）【124】

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 1 世纪的波斯普鲁斯王国【126】

公元前 2 世纪的希腊化世界【128】

公元前 2 和前 1 世纪的叙利亚与巴勒斯坦【130】

公元前 2 和前 1 世纪的印度 - 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王国【132】

希腊化时期的贸易路线（公元前 4—前 1 世纪）【134】

第七章 强权时代（公元前 4/3—前 1 世纪）

Part B 罗马崛起，成就世界霸权

罗马人统治之下的意大利：社会体系（公元前 338—前 89/82 年）【136】

第一、第二次布匿战争【138】

罗马帝国在共和时期的领土扩张【140】

罗马撒丁岛、科西嘉与西西里行省的发展（公元前 3 世纪—公元 5/6 世纪）【142】

罗马行省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发展（公元前 2 世纪—公元 5 世纪）【144】

罗马北非行省的发展（公元前 146—公元 395 年）/ 罗马与朱古达的战争（公元前 112—前 105 年）【146】

罗马在西方的战争（公元前 206—前 101 年）【148】

罗马在东方的战争 I（公元前 214—前 129 年）【150】

罗马在东方的战争 II（公元前 214—前 129 年）【152】

罗马的殖民活动【154】

同盟者战争（公元前 91—前 87 年）【156】

罗马人与米特里达泰斯六世的三次战争（公元前 89—前 85 年，公元前 83/82 年，公元前 74—前 63 年）【158】

庞培整顿东方（公元前 67—前 59 年）【160】

罗马统治时期的克里特与昔兰尼加行政史（公元前 96 年—公元 6 世纪）【162】

凯撒任职高卢总督（公元前 58—前 50 年）【164】

罗马高卢行省的发展（公元前 1 世纪—公元 4 世纪）【166】

公元前 49—前 45 年内战时期的罗马帝国【168】

2 ▶ 目录

公元前 44—前 30 年内战时期的罗马帝国【170】

第八章 帝国时期的罗马帝国（公元 1—5 世纪）

罗马城【172】

奥古斯都对罗马和意大利的分区【174】

奥古斯都至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斯时期的罗马帝国诸行省（公元前 27 年—公元 211 年）【176】

埃及和阿拉伯的罗马诸行省的发展（公元前 1 世纪—公元 6 世纪）【178】

黎凡特地区的罗马诸行省的发展（公元前 1 世纪—公元 4 世纪）【180】

小亚的罗马诸行省的发展（公元前 2 世纪—公元 5 世纪）【182】

巴尔干半岛北部的罗马诸行省的发展（公元前 1 世纪—公元 4 世纪）【184】

南巴尔干半岛的罗马诸行省的发展【186】

多瑙河中游的罗马行省的发展（公元前 1 世纪—公元 3/4 世纪）【188】

所谓的巴塔维亚叛乱和罗马内战（公元 69/70 年）【190】

不列颠的罗马诸行省的发展（公元 1 世纪—公元 410 年）【192】

罗马帝国的大道和道路【194】

地中海重要的农业区域（公元 1—2 世纪）【200】

罗马帝国的贸易路线（公元 1—3 世纪）【202】

公元 1/2 世纪地中海到印度的陆上和海上路线【204】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斯统治时期的罗马帝国（公元 193—211 年）【206】

军团部署和罗马帝国的边界【208】

不列颠尼亚、日耳曼尼亚以及雷蒂亚的边界【210】

罗马帝国的东部与南部边界（公元 1—3 世纪）【212】

公元 1、2 世纪的阿尔萨西德王国（至公元 224 年）【214】

萨珊帝国（公元 224—651 年）【216】

士兵—皇帝时期的罗马人与萨珊人（公元 3 世纪）【218】

“帕尔米伦帝国”（公元 250—272 年）【220】

高卢帝国（公元 260—274 年）【222】

公元 4 世纪罗马帝国的行省管理【224】

基督教集会的发展壮大（公元 1—4 世纪）【226】

基督教会组织 / 基督徒朝圣路线【228】

日耳曼人居住区的文化发展【230】

日耳曼民族迁移并入侵罗马帝国【232】

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继承国【234】

第九章 拜占庭帝国时期（公元 5—15 世纪）

查士丁尼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公元 527—565 年）【236】

拜占庭的军区制（公元 7—9 世纪）/ 君士坦丁堡【238】

拜占庭与萨珊王朝之间的冲突（公元 6—7 世纪）【240】

前四任哈里发时期阿拉伯各部的统一与扩张（公元 632—661 年）【242】

巴兹尔二世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公元 976—1025 年）【244】

拜占庭帝国中期的经济【246】

前三次十字军东征（公元 1096—1192 年）【248】

拉丁帝国时期的东地中海世界（公元 1204—1261 年）【250】

巴列奥略王朝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公元 1261—1453 年）【252】

附录

地图释文的补充（资料来源、参考文献及相关表格）【256】

缩写表【276】

本书作者【283】

索引【285】

地图与释文

埃及和古代近东地区人们的世界观

一、新王国时期埃及人的世界观

(约公元前1570—前1080年)(地图A)

埃及人的世界观是埃及“中心主义”的镜像，映射出埃及文化的二元性特征。埃及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分别为：塔-梅胡(Ta-Mehu，下埃及，或尼罗河三角洲)和塔-瑟茂(Ta-Shemau，上埃及，尼罗河谷至第一瀑布的厄勒凡汀(Elephantine)之间)。埃及国王统一了整个埃及版图。上下埃及及代表性植物空心草和莎草的连接，象征着埃及的统一，但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埃及在建立王朝国家之前一定是由这两大区域组成的。

虽然埃及的疆域从未超出以上描述的地理环境，但埃及新王国时期的王室文献表明，这一时期埃及及王朝国家的主题便是扩张领土。埃及的疆域在新王国时期达到鼎盛。国王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is I，公元前1504—前1492年)和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is III，公元前1479—前1425年)在尼罗河第四瀑布的库古斯(Kurgus)地区竖立边界石碑，该地距尼罗河上游盖加巴尔·巴卡(Gabal Barkal)约250公里；在美索不达米亚，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卡尔卡米什(Karkemish)同样也竖立了边界石碑；但埃及国王在征战所至最远处设立的界碑并不意味着对这些地区的实际统治。疆域扩张伴随的是埃及人对周边地区和外族认知的加深。因此，当埃及士兵走出埃及，描述起埃及之外的地名、地貌和异域文化时，他们大多认为前往埃及之外的地区前途未卜，充满危险；埃及之外皆是禁区，猛兽、毒虫的威胁无处不在，甚至连水都有毒，无法饮用。这些士兵的记录中充满了埃及人对返乡的渴望，甚至在埃及文学作品中，对孟菲斯的乡愁还成为了一种固定的修辞手法。

尽管埃及人在新王国时期对外族地区已存在了解，但他们关于“九弓人”(Nine-Bow-Peoples)的认知却可以追溯到

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0—前2160年)，并一直延续到新王国时期。“弓”，指外族以狩猎为生的社会形态，数字“九”，则指代所有外族人。

“九弓人”，传统上是指生活在塔-梅胡(下埃及)和塔-瑟茂(上埃及)之外，由爱琴海的哈乌-奈布(Hau-Nebu)人、埃及文化圈之外，(幼发拉底河以外地区)中东地区的孟图-塞泰特人(Mentu-Setet)、生活在三角洲西部，昔兰尼加和埃及绿洲北部之间，利比亚地区的泰梅努人(Temehu)或泰赫努人(Tehenu)、利比亚沙漠中的赛赫赫-加姆人(Sechet-jam)、尼罗河与红海之间东部沙漠中的佩杰图-舒人(Pedjtu-Shu)、尼罗河第四瀑布地区的伊温图-塞提人(Iuntu-Seti)，以及库什以南，源于塞(Sai)岛，位于第二和第三瀑布之间的萨特人(Shat)共同组成。

这些“九弓”被记录于埃及神庙墙壁、廊柱和其他一些物品上，多达120余次，年代从中王国时期(约从公元前2060年开始)一直延续至罗马统治时期结束。但我们至今仍无法知晓“九弓”指的是一些国家还是民族；此外，我们更无法追溯这些模糊名称的起源和内涵的演变。埃及人对周边疆域的认知程度越高，探索“九弓”的范围就越远；相反，随着埃及在新王国以后的衰落，埃及对外族影响也就越弱，“九弓”也距埃及人越近。

除已知区域外，上文提到的地名中包含了一些特殊地名，它们通常被刻写在象征城墙的椭圆形物品上。当埃及人用这些地名来描述埃及北部或东北部时，它们都被很难准确、详细地记录下来，我们可以从同时期的其他语言文献中找到旁证。但是，对于埃及西部和南部的一些地区，这些记录却变得十分模糊，而这些地区也并非没有任何文献留存下来。

此外，其他文献中也记载了传统上埃及人所熟知的地名。如代表下努比亚地区(位于尼罗河第二瀑布下游)的瓦瓦特(Wawat)和代表上努比亚地区的库什(Kush)。库什在多数情况下被埃及人描

述为“可怜的”库什。埃及人使用“瑞特努”(Retenu)指代巴勒斯坦地区；查鲁(Charu)指代叙利亚；哈提(Hatti)指代赫梯王国；伊斯(Isi)或伊里斯(Ires)指代塞浦路斯，虽然这一个地区现在仍然存在争议；科夫图(Keftu)指代克里特。另外，蓬特地区则被埃及人誉为“神的领地”，目前学界有观点认为，此地并不是之前认为的索马里，而是位于阿拉伯半岛上的某个地区。

二、新亚述帝国时期亚述人的世界观(公元前8/7世纪)(地图B)和巴比伦的“世界地图”(约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增补图)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们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地理知识。即便在某些特定区域中，会有一些商人、士兵和行政官因从事相关职业而对地质、地貌有一定了解，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得出古人已对地理环境存在准确认知的结论。当现代学者对文献中的记录进行考察时，应该认识到那时的历史记述和神学都包含了大量推理和猜测的成分。以下两个例证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与实际情况有着巨大出入的认知。

地图B涵盖了公元前8和前7世纪亚述铭文和书信中记录的最远地域。正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地图中关于地理的描述显然超出了亚述军队实际征服的地区，而这些远离王国边界和政治影响力之外地区只是偶然地被记录下来而已。因此，地图中所能展现的仅为亚述王权统治下对地理环境认知的最小视域，而亚述人关于地理的实际认知状况可能远超过于此。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河流与太阳的光芒皆是创世的中心，任何在大河上游的地区都被称为“上”，下游地区则都被称为“下”。正因如此，地中海被称为“上海”，波斯湾被称为“下海”。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流向是由北向南，与我们相比，风向顺流向左偏八分之一，由此形成了风来自西北、东北、

东南和西南的情况，而这四种风向的形成也是受到了太阳东升西落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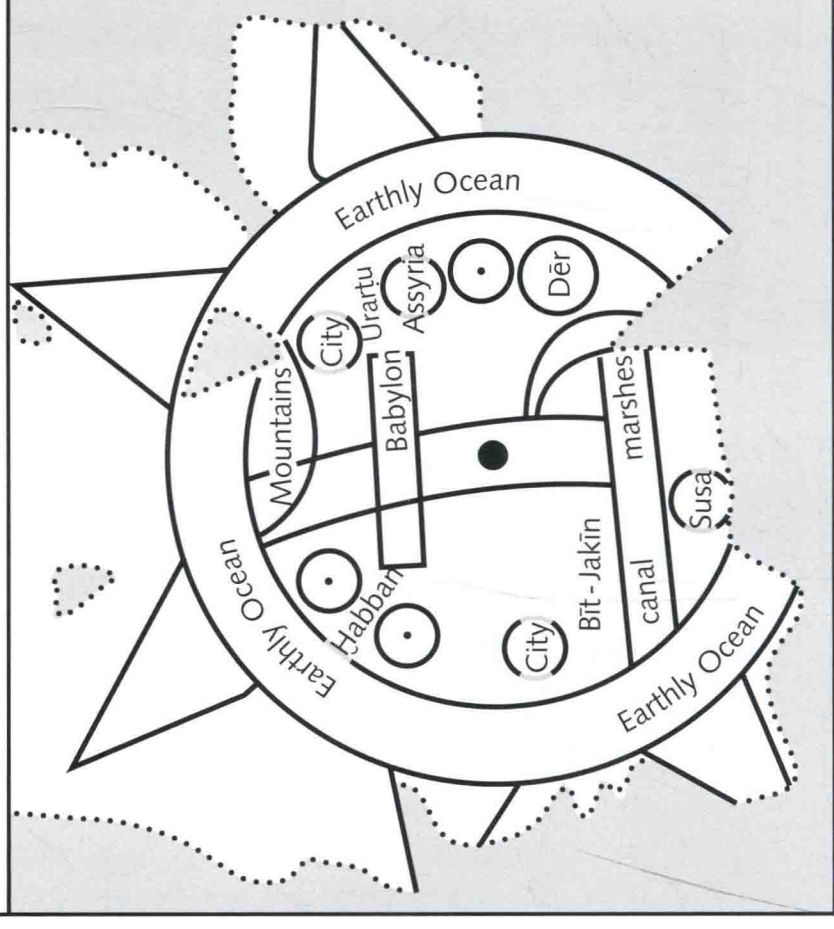
本页增补图所呈现的地貌基于一位巴比伦学者(他可能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绘制的地图框架结构，与地图B相比(见图中绿线)，这一增补图所体现的关于地域的认知显得非常狭隘：图中内环所描述的范围与图B相同，亚述和乌拉尔图位于图中边缘模糊地区；但最令人吃惊的是，图中完全缺失了与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往频繁叙利亚地区。如此粗糙的绘图表明了作者似乎从未想要绘制一幅精准的地图，其用意仅为试图表现出图中圆形以外的区域被海洋所环绕，环形区域也仅为当时世界的一部分。另外，在泥板上发现的破损文献也印证了图中海洋的边缘由三角形组成。显然，作者对环形区域内的地理环境并不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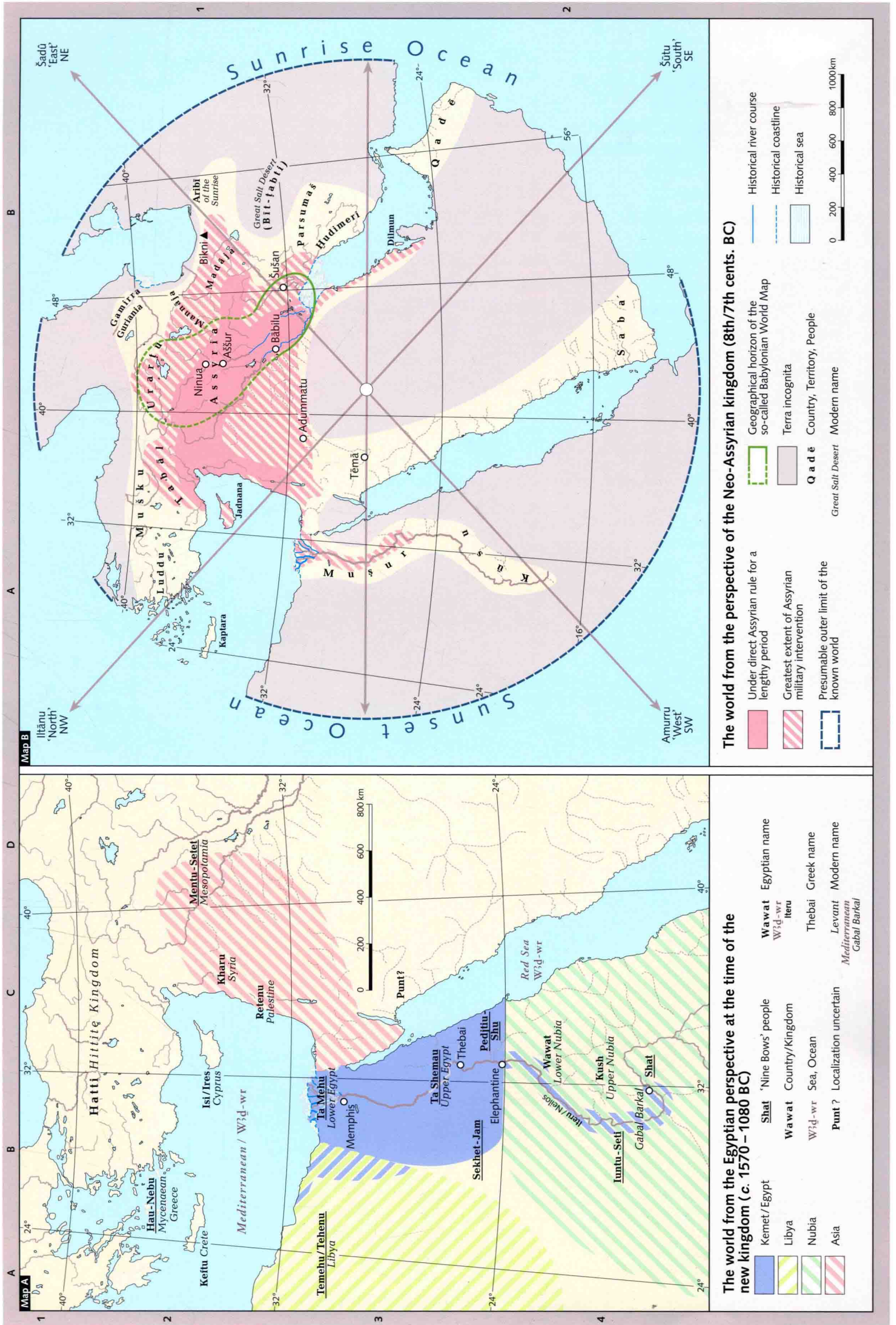
兴趣，地图的绘制仅是作为对世界和边缘的一种猜想。以星星为图像的两个同心圆和外围的三角形组成了一个整体，代表了月神辛(Sin)、太阳神沙马什(Samas)，以及金星女神伊斯塔尔(Istar)。

显然，与其他物体相比，人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生命存在。这份手绘图仅是众多相互矛盾的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世界的唯一一份结构图。这是当时存留下来的唯一地图。也正因如此，这种环形世界被海洋所包围的认知在古代世界盛极一时，其影响直至中世纪，在中世纪的地图中，星型的构图仍有所保留。

参见第17, 19, 21, 53, 55, 59页地图。

So-called Babylonian World Map (c.1st half of 8th cent. BC)





4 ▶ 古代著作家视阈中的世界

古代著作家视阈中的世界

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关于地图绘制的知识因古典著作家的著作流传至今，但即便是这些流传于世的地图，大多也仅为一些残篇。

如暂且搁置现存文本中关于这些地图绘制意图的争议，那么便可进一步从古典著作的记录中大致重新推断并构建出古代世界地理环境的整体面貌。

这里讨论的“重新构建 (reconstruction)”，或许会引起歧义，因为古典著作家，如公元前 5 世纪时期的赫拉克利德 (Hellenicus, Dion. Hal. Rhet. 10.11)，在著作中所探讨的地图并非现代意义上精确的地图。当使用“重新构建”一词时，古典作家希罗多德或埃拉托色尼 (Eratosthenes) 在作品中指代的是古典著作家对当时世界的认知观念，而非指代绘图和世界地图本身。

一、赫卡塔埃乌斯

(Hecataeus, 公元前 6/5 世纪) (地图 A)

公元前 6 世纪，米利都的阿纳克西曼德 (Anaximander of Miletus) 绘制了第一张世界地图；他的学生赫卡塔埃乌斯修复了阿纳克西曼德存留下来的地图。

在其旅行中，赫卡塔埃乌斯丰富了地图中包含的信息。最具代表性的变革便是其运用精准的几何图形来绘图：以地中海为分割线将世界分为欧洲和亚洲两部分，并将利比亚划入亚洲。世界被海洋所环绕并与地中海、红海和里海相连接。图中底部的海洋被认为是尼罗河的

源头。

图中绘制的多瑙河流经欧洲中部，尼罗河将亚洲分为两部分，面对地图本身存在的问题，菲力克斯·雅各布率先指出，将很难修复赫卡塔埃乌斯的地图。公元前 499 年，阿里斯塔格拉斯在他的家乡米利都出任使节时随身携带了这幅地图的青铜副本，他向斯巴达谏言，支持实力上升的伊奥尼亚人 (Ionian)，以共同反对波斯大王 (Hdt. 5.49)。类似的地图在当时很普遍，而阿纳克西曼德在此之前便游历过斯巴达，因此斯巴达人对这样的地图并不陌生。地图中描绘了波斯帝国的版图和财富状况 (见本页插图)。斯巴达人对波斯的强大版图感到震惊，他们按照地图行军，从爱琴海岸到波斯国王在苏萨的官邸，跋涉了 3 个月，这绝对是无法忍受的，所以当斯巴达人抵达苏萨后，马上将阿里斯塔格拉斯驱逐出城。

二、希罗多德 (公元前 5 世纪) (地图 B)

希罗多德绘制的世界地图与阿纳克西曼德和赫卡塔埃乌斯两人截然不同：他认为多瑙河与尼罗河两条河流地理上平行分布，流向皆为自西向东入海；从被誉为“赫拉克勒斯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到东部亚速海海岸之间的海洋将世界两大陆地——北部的欧洲和南部连同利比亚的亚洲——分割开来。

地图中南部的非洲和亚洲大陆被地中海边缘的直布罗陀海峡相连接，而此前赫卡塔埃乌斯认为地球是被海洋所环绕的岛屿的观念被希罗多德彻底抛弃，希罗多德认识到里海是一个内陆海，并不与任何大洋相连接。

三、埃拉托色尼 (公元前 3 世纪) (地图 C)

在其《地理志》(Geographiká) 第 3 卷存留的残篇中，这名昔兰尼加学者运用其数学和天文学知识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他遵循地理学家迪凯尔库斯 (Dicaearchus, 公元前 4 世纪) 的理论，用平行线绘制地图，其中以罗德岛 (Rhodos) 向金牛星方向 (北纬 36 度) 贯穿印度的一条为中心线。此外，他又绘制了 6 条平行线，最南端穿越塔普罗巴尼 (今斯里兰卡)，最北端穿越北极，并依据气温和植被种类的不同来区分地域。在这幅地图中，印度河并不是从西北流向东南，而是由正北流向正南。他同样认识到了里海是通向大洋的出口。地球是个圆形的观念，从公元前 6 世纪被提出，并逐渐在公元前 4 世纪时期被世人所接受。虽然埃拉托色尼在其关于地球的论著中已经认识到地球是个圆形，但在这幅他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却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四、克劳狄乌斯·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aeus, 公元 2 世纪) (地图 D)

推罗的马里努斯 (Marinus of Tyre, 公元 2 世纪) 与其同时代的托勒密同为古代世界最优秀的地理学家，他们都已认识到世界是由海洋、内海与陆地共同构成的。马里努斯绘制的地图采用横向圆柱体横截面来展示整个世界。纬线穿越罗德岛 (北纬 36 度) 向东，从本初子午线一直到达西部“长乐岛” (Islands of the blessed)，按照这样的子午线绘制法，地球的两极便被忽略了。共有 16 条子午线与罗德岛线 (纬线) 成直角，它们以等距分列 (每个相隔 15 度)，每个子午线之间相隔 1 小时。马里努斯以简陋的天文设备观测，并结合他的旅行和航海日志记录了地球的英里数。

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Geographike Hyphegesis) 是现存最古老的关于世界地图的典籍，其运用大量数学和占星术绘制了当时的世界。虽然他一定程度上批判了马里努斯的绘图，但其著作却是基于马里努斯的成果之上完成的。托勒密的著作中就有可能就包含了地图，实际上，从 13 世纪的希腊文圣经手稿中也流传下来了相关地图，虽然关于这些地图直到最近才被证明是伪造的，而与此同时，可靠的证据表明，托勒密绘制的地图是真实存在的。托勒密运用了较为简洁的经纬线 (起始线：罗德岛线；与极点同心与经线垂直延伸) 和比较复杂的圆锥截面 (起始线：塞尼线，弧形的子午线，见地图 D) 来绘制地图 (Ptol. 1.23; 24.1-8)。这幅方形图发现于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第 2—7 卷中关于定位欧洲的篇章中，而关于利比亚和亚洲的地理方位绘制则参见第 8 卷第 26 节的地图。

